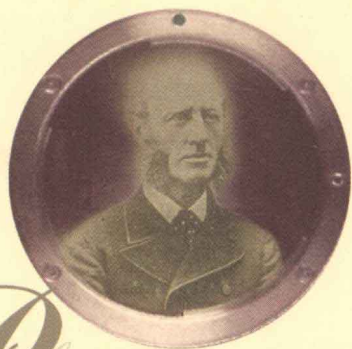




Parkes

巴夏礼在中国

[英] 斯坦利·莱恩-普尔 著
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Consul in China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金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 斯坦利·莱恩·普尔 (Stanley Lane-Poole)
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 (Frederick Victor Dickins)

著

巴夏礼在中国

金莹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夏礼在中国 / (英) 莱恩-普尔, (英) 狄更斯著;
金莹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633-7855-5

I. 巴… II. ①莱…②狄…③金… III. ①巴夏礼,
H.S. (1828~1885) —生平事迹②中国—古代史—史料—
清后期 IV. K835.617=43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748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91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6.25 插页: 1 字数: 40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5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序

周振鹤

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转变。晚明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表示世界观念的是“天下”这个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加上四夷的天下。这样思考问题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国就一直都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在陆上有参天可汗之道,从海上则是万国梯航来朝。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所谓“声教广被,无远弗届”是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周围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外交的意识,有的只是藩属朝贡的概念。但16世纪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世界地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声教所被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合在一起,也只不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还有更多的国家处在“化外之地”里。原来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一的知识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少数人中间,世界的概念已经开始代替了天下的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这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觉悟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世界地图这回事,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是不愿意正视

这一事实。其实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在宫廷中绘制过几种世界地图,但这并没有动摇皇帝的天下意识。1793 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朝贡式的外贸关系,但装载使团进献给皇帝的礼物的车子上,依然被插上了写有进贡字样的旗子。乾隆皇帝不但认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毋庸与远在九万里之外的蕞尔小夷互通有无,而且仍以天下共主的意识,要求使团人员行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乾隆是看过世界地图的,但心理上依然不放弃“中国的世界”的观念。但不过半个世纪,他的孙辈就不得不面对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痛苦的、真正的转变。列强要求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制度,而不是将他们当朝贡国看待。他们要求在京派驻外交官,以平等礼节觐见皇帝,也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关系。但是很不幸,这些要求都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中西及后来中日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的研究,自然是晚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外交史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外交官又当然是外交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其中对驻华外交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正当传教士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对最早来华的三类洋人之中的外交官与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多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个案方面。例如,19 世纪后期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日外交官的巴夏礼,其传记的下半部写的是驻日生涯,在日本早就被翻译了出来。而在中国可以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传记的存在,更不知道其上半部主要写的是巴夏礼的在华经历。《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对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贡献一些基本的文献资料。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C. V. Langlois)和塞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说过:“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这套丛书就是从这一宗旨出发而提供给读者的一批基本文献,让读者看到晚清的外交史的部分图景。当然,传记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传记作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一般读者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研究传主生平津梁,只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被其结论所制约,而只着重其对事实的铺陈。当然事实也可以粉饰,更可以歪曲,但如果我们能不止于阅读一种传记,而是在

阅读传记的同时参考更多的历史资料,粉饰与歪曲是可以被我们看穿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比较的阅读法。因此,这样的文献是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这一点相信任何读者都是心中有数。

历史作为消逝了的过去,并不是今天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它只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与诠释中再现,所以历史本体自身必然带有诠释性,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重现——这当然指的主要是人类史而不是自然史,人们几乎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如果说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复原还有一定的客观性的话,对于人物生平活动的复原就更多地带有历史编纂家的主观意识。因此,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经过历史认识主体重新建构的历史。也因此,我们并不担心这套丛书原作者所构筑的历史就会直接成为读者心中的历史,而相信读者心中的历史必定是远比传主所复原的更加完善的历史。

这套传记的出版除了给读者提供一种文献的来源以外,还希望读者借着这些文献进而检索该传记所依据的更为原始的史料,同时还发现其他的史料作为补充或者修正,以彻底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举例而言,本丛书中的美国外交官伯驾传,除了这本传记外,在中国人的记述里,还有其他的资料,这里仅举两条以资对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件《粤东全省商民直白》中有这么几句话:“咪利坚美士伯架,设立医馆,赠医送药,普济贫民,而中华士庶,无不赞美其德。”这是指的他当传教士医生时的事。而在前一年的《广东全省绅耆士庶军民人等声明》则说:“该国现有医生伯驾,向习外科医眼等症,并无别术声名,不识民情事势,不过在粤业医数年,稍晓广东土话数句而已。兹因该国公使不在,暂令其摄理印信,辄敢窃权持势,狐假虎威,随处生波,骚扰居民,始则骗租晓珠、下九、长乐各舖,继则图佔靖远、荳栏、联兴等街,又强租硬佔潘姓行宇。我等初犹以为彼建讲堂医馆公事起见,詎料假公济私,营谋己宅,至乖条背约,欺蒙陷良,贪得无厌,廉耻罔顾。今又骗租南关曾姓房屋,至今輿情不协,街众弗容。伊乃胆敢砌词,混耸大宪,辄称条挟制,诬告我父母官长,种种不堪,殊堪发指。”这两条都是当时绅民对伯驾的认识,此外中国官员对伯驾也另有评论,这里不烦具引。所有这些记述,我们都可以作为重建历史的文献使用,至于对所有文献的理解能力,我们与读者是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的。

外交官天然地代表着派出国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晚清时期列强的外交官远不止是这一利益的代表,而是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过去在批评传教士的时候,往往用上“伪善”这个词,那无异于说,有些传教士表面上看来至少是善良的。但是外交官则不然,他们差不多连伪善的面目也不存在,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们有许多是明火执仗登堂入室的强盗。但有点共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从个体上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说传教士至少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外交官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又是如何呢?即使我们在传记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只是对传主的一味颂扬,但从他们对传主一生的叙述,我们依然可以明显看出“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上面提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却使之将“强权即是公理”的手段运用得十分纯熟。事实上,晚清到中国的许多外交官对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极为深刻,这一点早在晚清就被认识到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就说道:“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需要多知道一些驻华外交官一生的经历以理解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吗?毫无疑问,传记作者的偏见以及对传主的喜爱或崇拜,必定会使他们在写作传记时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甚至掩盖某些事实真相。但上面已经提到,历史并不是只靠唯一的史料来塑造的,读者必定会搜寻相关史料来对传记内容进行批判性的阅读,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在政治经济方面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外交官,是不是有些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贡献颇大,他编的汉语课本,他提倡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做法,甚至对中国标准官话从南到北的转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他设计的汉字罗马拼音系统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他本人后来则成了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又,英国驻宁波的第一任领事罗伯聃,也对中英语言接触有重要贡献,他将伊索寓言翻译

成中文,并且将寓言的内容改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又编纂有英语教科书《华英通用杂话》,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己编写英语教科书的范本。再如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翟理斯,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汉英词典,至今依然在语言接触史上有其参考价值,他又改进了威妥玛的拼音体系,使之更为完善。后来他继威妥玛成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在西洋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列强驻华外交官多数在晚清都起着形形色色的重要影响,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理清楚。我们要理解晚清以来的全部历史,就不能不把所有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物都作一番彻底的清理。传教士是一部分人,外交官又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对这些人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又如何全面深刻地认识晚清的历史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挨打的原因是不是落后,晚清的历史已经与世界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认识构建完整的晚清史,就少不了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来的各色人等。尤其在中国史学家尚未对来华各种人士作出深入研究时,作为重要参考读物的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外交官传记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物。

附带要说明的是,还在中国与西方列强建交以前,在中国的港口就驻有一些领事,处理各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商务往来。这与世界上的通行情况一致,即领事制度远早于外交活动。我们亦将这些领事列入外交官系列,事实上,有些领事后来也成了正式的外交官。而在中国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各地所有的领事馆自然从属于外交机构,领事也自然是外交官的组成部分了。

译者前言

由斯坦利·莱恩-普尔和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撰写的《巴夏礼传记》^①共分两册。第一册由莱恩-普尔一人所著,记录了巴夏礼在中国 24 年的外交官生活。第二册 3/4 的内容由狄更斯完成,记录了巴夏礼 18 年的驻日公使生涯。1883 年起巴夏礼回到中国任驻华公使,于 1885 年卒于北京。本书所译的是第一册的全部和第二册中涉及巴夏礼和中国事务的相关部分。

本书作者斯坦利·莱恩-普尔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量关于穆斯林历史的书籍,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西班牙的摩尔人》(*The Story of the Moors in Spain*)。1892 年,他接受巴夏礼家族代表的邀请,为巴夏礼撰写生平传记。《巴夏礼传记》第一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利用了大量未刊信函,其中弥足珍贵的是由巴夏礼的女儿提供的巴夏礼日记以及他与妻子芬妮、姐姐雒维林夫人、姐夫雒维林之间的私人信件,再加上巴夏礼和阿礼国、包令、额尔金、卜鲁斯之间的

^① Stanley Lane-Pool and Frederick Victor Dickins,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来往公函,从而较全面地再现了1842年至1865年间他在中国担任翻译官、副领事、领事的全部生活和工作图景。巴夏礼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之后,因为有妻子陪伴在身边,私人信件变得少之又少,相关的公文纪录当时也未出版。资料的匮乏和巴夏礼出任公使期间日本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大背景,使斯坦利·莱恩-普尔认为传记的第二册需要由一位见证了日本当时之变革的学者来撰写,于是他邀请狄更斯先生主笔。该册已经由高梨健吉翻译后在日本出版。^①

哈里·史密斯·巴夏礼(1828—1885),1841年来华投靠在澳门的亲戚,并师从马儒翰学习中文。从亲历1842年《南京条约》的缔结到促成1860年常驻北京代表的设立,巴夏礼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覆盖了当时中英交往的全部内容。1865年后他出任日本公使,见证了日本推翻封建幕府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可以说他在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在中国人的眼里,巴夏礼是臭名昭著的强权外交官,他本人信奉“在中国获取尊敬的唯一方式是下命令”。在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获得了日本政治家的高度认同。巴夏礼的师长和上司们均评价他是一个富有能力、精力充沛和值得信赖的人。

本书可以作为巴夏礼的生平传记来阅读。作者将个人置于历史之中,生动地刻画了巴夏礼的成长历程,对其性格之形成的分析细致入微。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幼年的巴夏礼具有超群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来到中国之后所经历的变化和工作上的转战使他一步步成为处理中国事务的明日之星。他管理中国的城市,参与条约的谈判,担任领事和外交职务,在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他的野心在功名和荣誉的鼓励下,越发膨胀。巴夏礼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每一个良机来好好表现自己,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公众的称许和英女王授予的荣誉。

本书也可以作为理解当时英国对外方针的读本。巴夏礼14岁时成为英国驻香港全权代表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后历任驻福州领事、驻厦门领事。1855

^① F. V. う“イキンス”,高梨健吉訳《パークス伝—日本駐在の日々》(译注:《巴夏礼传——在日本的岁月》),平凡社,1984年1月。

年作为赴曼谷使团的秘书,参与《英暹通商条约》的谈判。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与叶名琛斗智斗勇,并主张对中国出兵。1860年,他随侵华海军司令额尔金北上,在通州附近被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负有责任。巴夏礼的名字成了毫不妥协地以铁血手段来保障条约权利的代名词。他认为英国应当在中英关系中采取主动。在他的日记和信函中,不乏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和对英国应采取之立场的精到分析;亦有相当篇幅论及鸦片贸易、英国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猪仔贩卖与移民体系、租界管理与贸易开放等问题。

本书还是一部展现当时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一个领事的生活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巴夏礼在中国的工作有高潮也有低谷。低谷时期,他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对中国的考察之中。在大量被引述的日记和信件中,他对福州、厦门、广州、上海各地的民众生活常态和英国居民在各开放口岸的生活实景都有勾勒,对中国的建筑、饮食、服装、礼仪、自然风光均有详细描写。通过巴夏礼的记录,我们可以管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巴夏礼为上海最初之英国领事,并在公共租界内创立了会审公廨。1890年4月,为纪念巴夏礼,上海外滩竖立了他的铜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铜像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1984年,南苏州河路河滨公园内发现了铜像的基座,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本书是根据麦克米伦公司1894年的英文版翻译的,同时参照了高梨健吉的日文译本。其中涉及的专名(包括中外人名、地名与职官名等)均按照习惯译法翻译与复原。对于个别难以确定中文合适译名者,则暂用音译方式译出。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周振鹤先生对译稿进行仔细校改,并将不妥之处一一指正,在此深表感谢。

译者谨识
2007年4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001
第 1 章 第一次中英战争 1828—1842	001
第 2 章 扬子江上 1842	015
第 3 章 学徒 1842—1844	037
第 4 章 翻译官 1844	049
第 5 章 和阿礼国在一起 1844—1845	064
第 6 章 福州 1845—1846	073
第 7 章 上海 1846—1849	086
第 8 章 岛上的任务 1849—1852	100
第 9 章 广州 1852—1854	113
第10章 暹罗条约 1855—1856	134
第11章 “亚罗”号事件 1856	152
第12章 入城问题 1856—1857	168
第13章 占领广州 1857—1858	182
第14章 西江远征 1859	199

∴	第15章	等待战争 1859—1860.....	208
∴	第16章	向北京行进 1860.....	228
∴	第17章	北京的囚犯 1860.....	284
∴	第18章	沿河口岸的开放 1860—1861.....	266
∴	第19章	广州使命的终结 1861.....	285
∴	第20章	上海 1864—1865.....	300
∴	第21章	在中国的戈登 1864—1865.....	314
∴	第22章	琉球与台湾 1874.....	327
∴	第23章	朝鲜 1874—1883.....	337
∴	第24章	东京问题 1883—1884.....	354
∴	第25章	在北京的外交 1883—1884.....	368
∴	第26章	尾声.....	384
∴	译名对照表.....		399

第一次中英战争 1828—1842

1842年8月20日在明朝旧都举行的仪式,在古老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南京城墙的前方,英国士兵为发动进攻作着准备。扬子江宽阔的水面上,70多名英国士兵正在为运送火药而忙碌。面对来自中国长时间的侮辱和伤害,伯驾^①提督和郭富^②将军终于决定予以应有的惩罚。但是由谁来负责实施这一行动尚未成定论,因为他们中谁也没有作好足够细致的准备。外交,而非战争,才是值得推崇的工具。驻华公使璞鼎查^③打算在中英之间缔结一份条约,把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摆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中国人已经在乍浦、吴淞和镇江见识过

① 译者注:伯驾(1781—1869),出身英国贵族。1841年5月12日,英政府任命伯驾为侵华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统率英侵华舰队一路进攻厦门、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直至1842年8月战争结束。1843年5月,伯驾以战功晋位爵士,年俸300英镑。

② 译者注:郭富(1779—1869),生于爱尔兰。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于1841年3月2日抵达广州。

③ 译者注:璞鼎查(1789—1856),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全权代表。1841年继义律之后作为全权代表来中国,扩大侵略战争,率舰队攻陷厦门、定海、宁波和乍浦。1842年6月侵入长江,攻陷吴淞和镇江,8月在南京与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南京条约》。次年兼任香港总督。



数量众多的英国炮舰,帝国使团也最终同意派出足以代表天子权力的大臣来南京商讨和平事宜。在中国的历史上,帝国政府将第一次和一个“外藩”签订战败条约,凌辱将(以书面形式)让位于国际宽容。条约的交换仪式无疑是值得铭记的。在“皋华丽”号巡洋舰的甲板上,中国使团得到全权大使的接见。当3位中国政府的官员迈开脚步,第一次踏上英国的炮舰时,甲板上全副制服的官员们兴奋不已,海军展示着他们引以为豪的武器,乐队演奏着他们拿手的乐曲。

在盛况空前的仪式中,一个瘦长的金色头发的男孩,被非常正式地介绍给帝国使团。他就是哈里·史密斯·巴夏礼。他有着特别年轻的脸庞和活泼的蓝眼睛。这一刻,14岁的巴夏礼出现在历史性的场景之中。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后来的40余年间,巴夏礼在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1842年,他开始在南京替璞鼎查处理公文,后来他作为大英帝国的公使被派往北京的朝廷。巴夏礼繁忙而波澜壮阔的一生在1885年画上了休止符。

《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巴夏礼受雇于马儒翰^①。马儒翰当时是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巴夏礼正在努力地跟他学习中文,希望可以成为一名翻译官。那段日子的经历还不算是对他的综合能力的测试。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想得到成为一名学者型翻译官的机会是很难的。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不会是一个喜欢语法的人,巴夏礼本质上就是这一类行动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行动和责任感就像是维持生命的呼吸。正是他们制造了印度帝国,在地球上布下英国的殖民地。迄今为止还很难用一种综合测试来测定他们无与伦比的品质。

13岁的男孩在中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归因于一连串的机缘。哈里·史密斯·巴夏礼于1828年2月24日出生在斯特拉福德郡沃尔索尔附近的教区。30年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关于他出身的各种传奇故事也纷纷被创造出来。然而,事实总是简单而缺乏罗曼蒂克情调的。他的家位于英国中部,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许多家庭成员被送去教会或者参加海军。他的祖父约翰·巴

^① 译者注:马儒翰,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之子。

夏礼在赫尔佐温开了个诊所,并且和威廉·博拉斯通家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翰,是一名海军上尉;一个叫哈里,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银行工作多年之后创立了巴夏礼公司,他的铁厂至今仍在运作,只是不再与巴夏礼家有任何瓜葛。巴夏礼的父亲被描述成精力充沛和独断独行的实业家,他不安于银行职员的工作,开创了自己的工厂,并全身心地投入困难和风险并存的铁厂实业中。他的儿子和他一样充满了活力和勇气。父子俩的个子并不高,都长着明亮的眼睛。巴夏礼的父亲还是受人欢迎的社交能手,擅长背诵和歌咏。据说他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打动了巴夏礼母亲的芳心,于1821年携着心爱的女人的手踏入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妻子是乔治·吉通的女儿。乔治是一名文具商、书商,也是经营邮票和明信片的商人,住在布里奇诺斯。巴夏礼夫人聪慧的性格和体贴入微的魅力立刻为她赢得了丈夫家人的喜爱。3个孩子的诞生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哈里·巴夏礼是她最小的孩子。她欣慰地发现他具有快速的反应能力,这也在日后成为他显著的特征。她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训练他的记忆力,比如教他背诵《圣经》的全部篇章。即使在50年后,哈里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和母亲一起做祈祷的房间的样子。不幸的是,她照顾孩子的时间并不长。183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她打垮。在她逝世后的1年,也就是1833年8月3日,她的丈夫也死于马车事故。

相继失去父母的3个孩子跟随父亲的弟弟约翰来到伯明翰定居。他们的这位叔叔此时已从海军退役,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哈里不久就和他的堂兄妹们开始了在巴尔萨赫斯的寄宿制学校的生活。对他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在假期聆听约翰叔叔讲述英国人在海上的胜利和英雄水手尼尔逊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萌生了为英帝国的伟业奉献自己的想法。然而好景不长,1837年,灾难再一次降临到巴夏礼的身上,他的水手叔叔突然病逝,他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极度拮据的境地。尽管如此,孩子们并没有放弃学业,而是改去普通的学校上课。1838年,哈里进入爱德华国王的语法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师从曼彻斯特主教。在那里的几年,他成为达拉谟、莱特富特和韦斯科特的同窗。爱德华学校的大师和学者们对巴夏礼个性的铸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尽管他还太小,无法在做学问方面鹤立鸡群,但他已经培养起了工作的精神和品格。

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情为巴夏礼兄妹到中国定居铺平了道路。巴夏礼的父辈的一位嫡亲表妹玛丽·温斯特加入了女士社团,并在1832年去马六甲海峡为传教士学校工作。1834年,玛丽与汉语专家、探险家郭实腊^①结婚。婚后不久郭实腊就被任命为商业监督,这被认为是当时驻中国官员的最高头衔。当郭实腊夫人得知她的表兄约翰去世的消息时,她正居住在澳门一所很大的葡萄牙住宅中。澳门是当时中国沿海唯一的欧洲殖民地,那时香港还未纳入英国囊中。郭实腊夫人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难民所,本着慈善家的精神,她收养了中国的盲童和弃婴。她也邀请她的两个已成为孤儿的表侄女来和她同住。凯瑟琳·巴夏礼欣然接受了她友善的请求,并在她妹妹伊莎贝拉的陪伴下,于1838年坐船来中国。和她们同船的乘客中有著名的中国学者和传教士麦都思^②及其妻子,还有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雒维林^③,后者日后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工作。凯瑟琳和雒维林在这次航行中萍水相逢并坠入爱河,1841年结为夫妇。^④

对这两个年轻的女孩来说,在中国开始她们的生活并非易事,普通人也很难想象。确实,欧洲人对她们能否在这一广阔的大地上居住是心存疑虑的。

① 译者注:郭实腊(1803—1851),德籍新教传教士。1835年2月被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聘为翻译。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后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其外文著述有70余种,较著名的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

② 译者注: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传教士。他在东南亚一带传教近20年,曾于1835年从广州北上,游历上海和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等地。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他即到上海定居,建立墨海书馆。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机构。

③ 译者注:雒维林(1811—1896),英国利物浦人。1839年受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指派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舟山、宁波等地传教施医。遗著《在华之教会医师——二十年经验之叙述》,为清嘉庆以后60年间不可多得的医学史料。

④ 他们两个人生活得很愉快。这本回忆录要感谢他们的鼎力相助和良好的记忆力。应该说,如果没有雒维林先生提供信函和可信的信息,此书是无法完成的。